

國立政治大學九十年度
社會科學院「行政管理碩士學程」

報考書面審查資料

報考人：郭 淑 瓊

報考組別：國際事務與兩岸關係組

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八日

報 名 表

學歷證件影本

工作經歷審核表

工作經驗及專業表現

- 一、 自傳
- 二、 簡歷
- 三、 研究計畫書
- 四、 相關工作經驗年資證明 (服務證明書)
- 五、 在職證明 (聘書)
- 六、 其他 (在職進修結業證書)

自 傳

多國籍企業
在大陸投資行為之比較研究

研究計畫書

研究生：郭 淑 瓊

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八日

多國籍企業 在大陸投資行為之比較研究

目 次

壹、 研究動機與目的

貳、 研究內容

- 一、 多國籍企業之定義及其在大陸投資之進程
- 二、 多國籍企業之理論與文獻回顧
- 三、 中國大陸外資政策的演變及吸引外資概況
- 四、 美、日多國籍企業與臺商在大陸投資行為及區位選擇之比較
- 五、 臺灣與美、日多國籍企業大陸投資策略聯盟之可行性評估

參、 研究方法

肆、 研究架構與流程

伍、 預期成果與研究限制

參考文獻

多國籍企業在大陸投資行為之比較研究

郭淑瓊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綜觀近代各國經濟發展之經驗，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長期閉關自守，在競爭激烈的國際政經局勢中，相互間的經濟合作是減少損失增加彼此利益的最有效方法，經濟安全與經濟利益在後冷戰時期的國際衝突中，佔據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各國的經濟角色使跨洲性的資訊與網路聯繫亦日趨頻繁。中國大陸對外改革開放在 1980 年代初期以吸收華僑及港澳臺投資為主，1984 年左右僅有少數日本及美國企業到大陸投資，在 1989 年天安門事件震驚國際，歐美企業對大陸投資的興趣急遽下降。直到 1992 年初鄧小平南巡，宣示改革開放應邁開大步向前的政策時，外資才開始大量進入大陸。適值 1992~1995 年吸收外資快速增長時期，中國大陸年均成長率幾達 200%。累計 2000 年底大陸吸引的全部外資協議金額已達 7,288.6 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為 3,701.1 億美元（中國經濟年鑑，各年）。

中國大陸爲了加速經濟改革，深化市場經濟體制，積極尋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而與國際經濟體系整合、積極參與國際分工以提昇國家競爭力。值此之際大陸利用國際資源，引進技術及資金，並積極融入國際社會自有其影響力。總之，大陸加入 WTO 之後可能創造更多新的投資機會，固然值得臺商密切注意並善加把握，但臺商們更應注意新形勢下市場競爭激烈所可能帶來的經營風險，千萬不能盲目躁進，必須有周詳的投資可行性評估。是故，企業經營成功的關鍵在於掌握充分的市場資訊做最好的準備，選擇最佳的進入時機，而不在於進入時間早與晚或前與後。另外，基於風

險規避的考慮，有意攻進大陸市場的廠商，或可先從貿易業務著手，直接投資活動應多採策略聯盟模式，尤其是與外商的跨國策略聯盟。於是無可避免地臺灣和大陸在多國籍企業的國際生產分工體系中各自扮演一定份額的角色。在多國籍企業評估下，兩岸在不同的產業的不同競爭優勢中，會產生何種國際生產分工模式？管窺中國大陸在 1995 年以來，全力推動高科技產業發展，以其產業投資環境仍然不穩定的情況下，對多國籍企業言，其高科技產品海外技術移轉的風險偏高，比起勞力密集產品更須慎選投資地點，因此高科技產業在大陸投資一般產業現況及中國大陸接受高科技產品的能力，在其達成要求多國籍企業作高科技移轉項目奏效可行後，今後我國承受大陸技術競爭的壓力將更為沉重。而臺灣在 WTO 全球化與資訊化浪潮下，面臨不穩定的政經情勢，新一波大陸投資熱正嚴厲挑戰「戒急用忍」政策，臺商遙望西側，不免也對中國大陸寄以無限憧憬，在前政府推向「南進政策」未見成效後，使得臺灣在過去 20 年來的「國際化」，並未真正落實，反倒是加強深化「大陸化」。的確，依經濟部投審會公布，2000 年 1~10 月間臺商赴大陸投資較上年同期增長 98%。

綜言之，在全球化發展及區域整合的大趨勢下，多國籍企業在世界上的地位是越來越重要，掌握兩岸加入 WTO 後的大陸外資政策變化、市場開放趨勢、臺灣與美日多國籍企業進攻大陸市場策略聯盟評估、多國籍企業在大陸投資行為與其所衍生的機會與挑戰，實為當前政府及企業界之重要課題，爰為本研究之目的。

貳、研究內容

本研究首先定義多國籍企業及其與大陸投資之關聯性，接著作外商投資與多國籍企業的理论分析，並預計以當前世界兩大對外直接投資者美國及日本，藉以深入探討多國籍企業在大陸投資行為及投資區位之選擇。在限定的研究地區及研究範疇內，本研究的主要內容涵蓋下列各項：

一、多國籍企業之定義及其在大陸投資之進程

依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解釋，多國籍企業（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 的定義是：「在兩個或多個國家建立子公司或分公司，而仍由母公司進行有效控制和統籌決策，以從事跨越國界生產經營行為的經濟實體」(王志樂，1996)。是故多國籍企業是現代化企業發展到國際化、全球化生產及經營模式，也是為適應生產流通高度社會化、現代化和國際化所創造的一種企業組織形式，是企業為適應高度複雜化的生產技術所進行之國際交換活動，及其合理有效地資源配置之運作方式。

多國籍企業的初期發展的確是產生在帝國主義強國或工業發達的國家，也在壟斷世界市場和剝削殖民地及落後貧窮國家發揮過作用。但在 20 世紀後期，有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如前蘇聯、印度和巴西；晚近的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如新加坡、韓國、臺灣及香港等，亦出現了為數不少的跨國性的多國籍企業(王志樂，1996)。目前，世界上大部份最重要的技術創新均由多國籍企業完成，不但推動了科技革命的進程，也深化了新的國際分工，技術壟斷越來越為多國籍企業保持其自身優勢，是控制掌握世界經濟的基礎。多國籍企業的直接投資可以繞過各國貿易壁壘在投資國就地生產與銷售，成為對付貿易保護主義的有效措施，且提供投資地主國有形與無形資產，從而增進其經濟、技術和文化的發展；加上近年來甚而擴大分支機構經營管理權限，將其子公司或分公司之管理階層儘量任用本地人，因此許多發展中國家以至發達國家都歡迎外來多國籍企業公司投資。

隨著近年中國大陸對外開放及吸引外資政策的逐漸落實，多國籍企業在大陸直接投資的比重也日益增加。據初步統計，世界排名前 500 大多國籍企業中，已到大陸投資者逐漸增加中，且日本、美國等著名的多國籍企業大多數已到大陸投資，這股狂潮我等不容忽視。揆諸多國籍企業在大陸投資辦企業是從改革開放以後才快速進展，大致可分三個階段：(一)第一階段是 1980 年代上半期，屬於考察試探期，僅有極少數多國籍企業到大陸進行少量投資；(二)第二階段是 1980 年代中後期至 1990 年代初，是進入擴大試辦期；(三)第三階段是自 1992 年至今。在經過十多年的考察和小規模試驗，越來越多的世界著名多國籍企業到大陸進行有系統且大規模投資。從十多年來多國籍企業在大陸投資辦企業對其造成之影響及效益如下：(一)促進大陸產業經濟結構的調整、升級與優

化，及新的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支柱的形成；(二)引進高新技術及提高大陸之技術水準；(三)以先進技術培訓管理人才和技術人員；(四)促進配套企業的生產協作及帶動關聯產業之發展；(五)充分利用國際資金建立現代化的技術密集產業、基礎產業與多國籍企業合資經營經濟效益後，增加財政收入；(六)有效替代進口和擴大出口發展對外貿易，有助於中國大陸外匯收支平衡；(七)提高大陸自有企業經營管理能力，並有利於其自有跨國對外投資企業借鑒，或因與他們合作經營而成長發展；(八)由於投資來源國基於利益考量，均願意促進雙方政治和經濟關係，而改善了國際關係與擴大國際間之經貿合作。(王志樂，1996)

當然，因有些多國籍企業在大陸投資的過程中，可能利用中國大陸管理體制的內在矛盾和漏洞，興辦一些限制投資的項目，造成環境污染致影響中國大陸之整體利益；中國大陸也害怕多國籍企業以其雄厚資金收購大陸國有企業或取得控股權；同時，以其商標替代大陸原有國產品商標，進而佔領大陸市場，實行壟斷提高其產品價格以獲取超額利潤；也可能在同母公司或它在其他國家的子公司的業務往來中，以比市場較高或較低的價格將利潤轉移。以上這些多國籍企業在大陸投資以來所呈現之問題及弊端，日後也許陸續會有其他問題產生，但整體而言，多國籍企業在大陸投資確實為中國大陸帶來的利益遠大於弊。

二、多國籍企業之理論與文獻回顧

茲將有關對外直接投資與多國籍企業理論，以往的文獻依照時間的順序作一回顧，俾對以往廠商直接對外投資的行為與多國籍企業的經濟活動有更深一層的瞭解。並將之分別以 1980 年代以前有關的文獻，如 Hymer 的產業組織理論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pproach)、Vernon 的產品週期理論 (Product Cycle Hypothesis)、要素秉賦理論 (Factor Endowment Theory)、內部化理論 (Internalization Theory) 與 Dunning 的折衷理論 (Eclectic Theory)，加以整理如下：

在 1960 年代以前尚無任何有關於多國籍企業與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只有一些研究企圖去瞭解與解釋廠商在國外的經濟活動。到了 1960 年代以後，以下

幾種重要的多國籍企業理論應運而生。

1. 產業組織理論

Hymer (1960) 指出廠商對外直接投資不只是資本移轉而已，還包含技術、管理技巧、企業精神等資源的移轉；並認為在海外直接投資的公司是處在不完全市場當中。多國籍企業一定擁有一些創新、成本、財務與行銷等優勢，這些優勢遠超過它在面臨地主國公司競爭時所面臨的劣勢，否則其無法克服缺乏當地市場知識、風俗習慣差異、距決策中心遙遠等不利因素，來和當地生產者競爭。這裡所稱的「知識」，包含了技術、管理、生產、行銷及決策等各方面的技巧。擁有這些優越知識的廠商，可以將這些知識運用於國外的生產之中，而使其生產成本下降，以彌補其前述之不利因素，並藉此獲得利潤。

2. 產品週期理論

首先，解釋多國籍企業何時對海外投資的理論為產品週期 (the product cycle) 理論。當 Hymer 以產業組織理論來解釋多國籍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時，Vernon (1966) 運用產品週期的個體經濟理論來解釋美國多國籍企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對外投資行為。Vernon 將產品的生命週期依序分為三個階段：新產品期 (new products)、成熟產品期 (mature products) 及標準化產品期 (standardized products)。產品週期理論的主要貢獻在於採取動態的觀點，說明貿易及投資之動態的關係，並重視生產與行銷之互動。雖然這項理論可以用來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廠商之海外投資現象，但對當前世界性跨國企業在選擇最有利的地方從事研究發展，及最佳地點從事生產等全球性整合擴充現象卻無法解釋。另外，此理論亦無法解釋為何跨國公司寧願放棄授權方式而採海外投資的行為。

3. 要素秉賦理論

針對日本企業對外投資情形，Kojima (1978) 認為上述二種僅說明了對外直接投資，乃歐美跨國性企業寡佔利益之延伸，並無法解釋對外直接投資亦可能發生在一般較不具特殊獨佔性優勢的中小企業。依據 Kojima 的看法，對外直接投資的要素除資金的移動，最主要是在於經營管理技術知識的移轉，因此他

認為造成對外投資二個基本要件為：(1)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在地主國具有發展潛力與比較利益；(2)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在投資國生產較為不利，但在地主國具有比較利益，並促使其在國際市場中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因此 Kojima 認為此日本式的對外直接投資，通常是屬於貿易導向型 (trade oriented) 的對外直接投資，而美國式的對外直接投資則大都屬於市場導向型 (market oriented)，主要是以擴展當地市場為主，其廠商至開發中國家投資只是寡佔或獨佔勢力的再延伸，此情形正好與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相反。

4. 內部化理論

Buckley and Casson (1976) 主要是指出在企業內構成供給與需求的過程稱為內部化理論。更清楚的說，乃是跨國企業的階級組織提供了相對於市場之外的一個跨越國境交易行為的機能，且當企業察覺到在跨國交易中，於內部自成一個供需體系所獲得利潤，大於藉著市場議價以建立生產網絡與擴大行銷市場所能獲得的利潤時，該企業較傾向於從事對外直接投資。另外，對於技術與管理知識等屬性之中間產品，由於具有高度之外部擴散效果。為了避免此種知識擴散至競爭者手中，可將之內部化。而在國際間進行內部化活動時，就產生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行為。

5. 折衷理論

英國 Dunning (1981) 嘗試將傳統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與得自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新發現相結合，創造出一套折衷理論。Dunning (1998) 進一步指出，在過去的 20 年中，世界經濟朝三個特點發展。第一，在大多數的工業經濟體中，智慧資本 (intellectual capital) 成為創造資產的主要財富。第二，全球運輸與傳播科技的進步和貿易與投資障礙的減少，創造了越來越多的全球經濟活動。第三，所謂的聯盟資本主義 (alliance capitalism) 的出現。越來越多的多國籍企業致力於跨國界的合作，除了隱涵知識和其他無形資產在國際間移轉，更隱涵了多國籍企業的經濟行為在地區別的分布。進而可知，1990 年代以來影響多國籍企業地區分布的因素，可區分為四種型態：資源追求型、市場追求型、效率追求型與策略性資產追求型。其特點有四：第一，空間交易成本角色的改變，反

映了跨國市場的自由程度和經濟活動特質的改變。因為這些成本的降低導致更積極的市場追求型對外投資，更因此加強了國際間的分工。第二，多國籍企業爲了增強他們的競爭優勢所尋找到的互補性國外資產與才能，越來越多是屬於便利知識（Knowledge-facilitating），這也就是爲什麼多國籍企業的分工越來越根深蒂固於地主國的原因。第三，爲取得策略性資產投資變得越加重要。第四，近來開發中國家的外來直接投資，主要是基於追求市場的傳統誘因，如中國大陸、印尼和印度，或是爲了獲得較低的實質勞動成本或利用其便宜的自然資源。

三、中國大陸外資政策的演變及吸引外資概況

（一）中國大陸外資政策的演變

自從 1979 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大陸經濟與市場的快速成長，已引起全球關注，也使大陸成爲亞太地區主要資金流入國，而貿易、外國直接投資以及國內高儲蓄率這三者之間的聯繫已經成爲大陸經濟快速成長的一項關鍵因素。

就大陸外資政策的發展而言，外資政策演變與市場開放進程是隨其國內經濟、經濟體制改革與產業發展需求而調整的，其中除了「改革開放政策」外，「鄧小平南巡」和「亞洲金融風暴」，均對大陸外資政策的發展帶來影響，從下列扼要說明可見其充分展現其彈性、務實態度與對外交之渴望。

1979 年 6 月大陸國務院於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所提工作報告中明列「繼續做好技術引進工作，積極利用國外資金，努力擴大出口」方針，同年 7 月，該會議更審議通過《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並於同年 8 月頒布實施，該法是大陸第一部涉外經濟法律。此外，爲適應改革開放和吸收外資工作發展的需要，全國人大於 1986 年和 1988 年先後頒布《外資企業法》和《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這三項吸收外資的基本法律和國務院及其各部委所通過的相關實施細則和辦法，除爲外商投資提供直接的法律依據外，也提供行政部門相當大的裁量權。（蔡宏明，2000）

外人直接投資（FDI）之客商來源，自 1995 年以來歐美日多國籍企業逐漸受大陸廣大市場之吸引，其所佔比重逐漸上升。其中，尤以美、日對大陸投注

資金之成長率最值得注目。回顧 1995 年時，一方面因諸多開發中國家競求國際資本；另一方面是中國大陸對自己吸引外資之魅力信心滿滿，較嚴苛的外資政策紛紛出籠，使得中國大陸在 1996~1997 年外資的流入增幅減少（張佩珍，1996）。有鑑於此，中國大陸改採微調手段與個案處理等方法，希望不要再嚇跑外商。1996 年 4 月 1 日後因新實施的外商投資進口稅收減免政策，許多外商又紛紛大力向中國大陸投資。大陸吸收外資失利，在 1998 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後一年旋即又現出端倪，當時由於人民幣堅持不貶，對美元幣值相對鄰近國家偏高，不利於加工出口，投資環境惡化，使得這些國家在大陸投資的廠商經營困難，其中南韓由於本身經濟問題較嚴重，因此大量減少對大陸投資，甚至倒閉撤資最為明顯。此後大陸吸收外資即開始萎縮。中國大陸當局一方面要挽回由於人民幣匯率相對偏高，使出口缺乏競爭力，且沿海地區土地、勞工成本逐漸升高，投資環境逐漸惡化的局面，一方面基於改善產業結構，及開發大西部的政策考量，因此改弦易轍，修正其吸收外資的方向，化消極的「來者不拒」的態度為積極主動的挑選符合其發展方向的外資，換言之，其吸收外資的重點將是質重於量。1998 年元旦，中國大陸見外資吸引有有回落現象，即將其外資政策快速微調，恢復大部份外商機器進口之免稅優待。1999 年 6 月 17 日國務院批准《外商投資商業企業試點辦法》將開放地區由原來的北京、上海、天津、廣州、大連、青島等 6 個城市和 5 個經濟特區，擴大允許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廣州、瀋陽、鄭州、武漢、蘭州、成都等經濟中心城市、商貿中心城市，可增設一至二家中外合資、合作企業。

中國大陸主管當局在 2000 年 9 月又宣布推行新的政策措施以吸引外資，主要有五大內容：(一)是鼓勵外商投資企業技術開發和創新。對外商投資設立的研究開發中心，在投資總額內進口的自用設備及其配套的技術、配件、備件，可免徵關稅和進口環節稅；外國企業向大陸境內轉讓技術，可以免徵營業稅，經批准，還可免徵企業所得稅；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技術轉讓收入免徵營業稅；外商投資企業技術開發費比上年增長 10% 以上者，經批准後，允許再按技術開發費實際發生額的 50%，抵扣當年度的應納稅所得額。對符合條件的、已設立的國家鼓勵類外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研發中心、先進技術型和產品出口型外

商投資企業進行技術改造，進口技術、設備、配件免徵關稅和進口環節稅；採購大陸生產之設備，可全額退還該部份增值稅並按有關規定抵免企業所得稅。其中有關研發費用可用以抵扣應繳稅額措施原為大陸對高科技產業優惠政策所無，可說完全模仿自臺灣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相關規定。(二)是鼓勵外商到中西部地區投資。對外商投資於《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中的項目可享受鼓勵類項目政策，其進口的自用設備及其配套的技術、配件、備件，免徵關稅和進口環節稅；放寬中西部地區吸收外商投資領域和設立外商投資企業條件，放寬中西部地區設立外商投資企業外商持股比例限制；對設在中西部地區的國家鼓勵類外商投資企業，可延長企業所得稅的減免期；外商投資企業到中西部地區再投資，凡外資比例達到 25% 以上的再投資項目，可享受外商投資企業待遇；允許沿海地區的外商投資企業到中西部地區承包經營管理外商投資企業和內資企業。(三)是按照大陸加入世貿組織的對外承諾，逐步擴大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進一步推進商業、外貿、金融、保險、證券、電信、旅遊等領域的吸收外資。外商投資零售商業企業的地域已擴大到省會城市、直轄市和經濟特區，外貿吸收外資的試點範圍也將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放寬。(四)是允許符合條件的外商投資企業在大陸 A 股、B 股市場上市；擴大跨國公司在大陸設立的投資性公司的經營範圍；簡化外商投資企業設立的審批手續，對不涉及綜合平衡的國家鼓勵類外商投資企業，不論金額大小，均可在省級政府審批。取消對外商獨資企業進口設備的價值鑒定；清理並調整不利於吸收外資的有關政策規定等。(五)是積極探討擴大外商投資的領域和方式，完善相關的法律規定，加快制訂鼓勵外商參與大陸企業改造和發展的政策措施，支持和促進外商採購和兼併等多種方式參與大陸國有企業的改組改造，進一步引入技術、資金、管理經驗和經營機制，提高外商投資企業和國有企業間配套生產與服務的能力和規模，大力發展龍頭產品的配套產業，引導國內企業進入跨國公司全球配套網絡，促進大陸國有企業的改革與發展，促進技術和產品結構調整。

此外，與加入 WTO 有關的是以後大陸區域性差別優惠政策在加入 WTO 後將逐漸取消，例如過去對經濟特區、開放城市、高新技術開發區以及最近對中

西部地區的租稅優惠，將逐漸取消而走向統一規範，不再成爲吸引外資的政策工具之一。

(二) 外商在大陸直接投資行為概述

大陸自 1979 年採行對外開放政策以來，1999 年外商直接投資方式的結構，顯示在合同金額方面，是以獨資方式佔最大比例，合資經營方式次之；而在實際利用外資金額上，則正好相反（見表一）。截至 2000 年爲止的 22 年間，共吸收了近 4,000 億美元的外資投入，協議外資金額 7,288.6 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金額 3,701.1 億美元，其趨勢大致呈現一路成長的情況（表二）。若進一步觀察這些外資的投資方式及地區來源可發現：截至 1999 年爲止，累計對大陸投資前十五位國家（地區）無論是項目數、合同金額或實際使用金額都以香港居首，且比重達一半以上；日本的協議外資金額雖低於臺灣，但實際使用金額則較高而居第三；臺灣對大陸的實際投資已達 238.63 億美元，排名第四（表三）。表四列示 1999 年大陸外商直接投資主要行業，其中以製造業金額爲最高，而製造業中又以「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的投資金額最高，佔了製造業金額的 15.6%。此外，據 2000 年 12 月 13 日電子時報報導，自 2000 年下半年起，海外 IT 企業紛紛宣布擴大在大陸投資，包括英特爾（Intel）、微軟（Microsoft）、IBM 與戴爾（Dell）等大廠。因爲 IT 企業看好大陸未來的市場，且其投資金額均相當龐大，相信未來歐美日多國籍企業在大陸的投資（特別是 IT 產業的投資）佔外商投資的比重將會明顯上升。（王思粵，2000）

表一 外商直接投資方式 (1999 年資料)

單位：億美元；%

| 方式 | 項目數 | 合同外資金額 | 比重 | 實際使用外資金額 | 比重 |
|---------|--------|--------|--------|----------|--------|
| 總計 | 16,918 | 412.23 | 100.00 | 403.19 | 100.00 |
| 合資經營企業 | 7,050 | 135.15 | 32.79 | 158.27 | 39.25 |
| 合作經營企業 | 1,656 | 68.03 | 16.50 | 82.34 | 20.42 |
| 外資企業獨資 | 8,201 | 207.06 | 50.23 | 155.45 | 38.56 |
| 外商投資股份制 | 3 | 1.03 | 0.25 | 2.92 | 0.72 |

| | | | | | |
|------|---|-----|------|------|------|
| 合作開發 | 5 | 0.5 | 0.12 | 3.84 | 0.95 |
|------|---|-----|------|------|------|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對外經貿部網站 (<http://www.moftec.gov.cn>)。

表二 大陸外商直接投資概況

單位：億美元；%

| 年份 | 協議投資金額 | | 實際投資金額 | |
|-------------|---------|-------|---------|-------|
| | 金額 | 成長率 | 金額 | 成長率 |
| 1979年~1983年 | 77.4 | — | 18 | — |
| 1984年 | 26.5 | — | 12.6 | — |
| 1985年 | 59.3 | 123.8 | 16.6 | 31.7 |
| 1986年 | 28.3 | -52.3 | 18.7 | 12.7 |
| 1987年 | 37.1 | 31.1 | 23.1 | 23.5 |
| 1988年 | 53 | 42.9 | 31.9 | 38.1 |
| 1989年 | 56 | 5.7 | 33.9 | 6.3 |
| 1990年 | 66 | 17.9 | 34.9 | 2.9 |
| 1991年 | 120 | 81.8 | 43.7 | 25.2 |
| 鄧小平南巡前 | 523.6 | — | 233.4 | — |
| 1992年 | 581.2 | 384.3 | 110.1 | 151.9 |
| 1993年 | 1,114.4 | 91.7 | 275.2 | 150 |
| 1994年 | 826.8 | -25.8 | 337.7 | 22.7 |
| 1995年 | 912.8 | 10.4 | 375.2 | 11.1 |
| 1996年 | 732.8 | -19.7 | 417.3 | 11.2 |
| 1997年 | 510.0 | -30.4 | 452.6 | 8.5 |
| 1998年 | 521.0 | 2.2 | 454.6 | 0.4 |
| 1999年 | 412.4 | | 403.9 | |
| 2000年 | 630.0 | | 407.7 | |
| 總計 | 7,288.6 | | 3,701.1 | |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各年。

表三 大陸投資前十五位國家/地區情況 (1999年累計)

單位：億美元；%

| 國別/地區 | 項目數 | 比重 | 協議外資金額 | 比重 | 實際使用外資金額 | 比重 |
|-------|---------|--------|----------|--------|----------|--------|
| 總計 | 341,538 | 100.00 | 6,137.17 | 100.00 | 3,076.31 | 100.00 |
| 香港 | 184,824 | 54.12 | 3,109.57 | 50.67 | 1,547.94 | 50.32 |
| 美國 | 28,702 | 8.40 | 526.1 | 8.57 | 256.48 | 8.34 |
| 日本 | 18,769 | 5.50 | 351.34 | 5.72 | 248.86 | 8.09 |
| 臺灣 | 43,516 | 12.74 | 437.74 | 7.13 | 238.63 | 7.76 |
| 新加坡 | 8,500 | 2.49 | 333.49 | 5.43 | 148.20 | 4.82 |
| 維爾京群島 | 2,031 | 0.59 | 204.05 | 3.32 | 93.95 | 3.05 |
| 韓國 | 12,726 | 3.73 | 163.20 | 2.66 | 88.37 | 2.87 |
| 英國 | 2,554 | 0.75 | 161.41 | 2.63 | 75.84 | 2.47 |
| 德國 | 2,128 | 0.62 | 93.35 | 1.52 | 48.11 | 1.56 |
| 澳門 | 6,418 | 1.88 | 93.09 | 1.52 | 36.36 | 1.18 |
| 法國 | 1,583 | 0.46 | 51.13 | 0.83 | 35.82 | 1.16 |
| 荷蘭 | 722 | 0.21 | 40.70 | 0.66 | 22.01 | 0.72 |
| 加拿大 | 4,351 | 1.27 | 70.65 | 1.15 | 20.49 | 0.67 |
| 澳大利亞 | 3,864 | 1.13 | 57.96 | 0.94 | 18.04 | 0.59 |
| 其他 | 18,937 | 5.54 | 397.92 | 6.48 | 177.16 | 5.76 |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對外經貿部網站（<http://www.moftec.gov.cn>）。

表四 大陸外商直接投資之主要行業（1999年資料）

| 類別名稱 | 項目數 | 協議外資金額 |
|-----------------|--------|-----------|
| 農、林、牧、漁業 | 762 | 147,170 |
| 農業 | 456 | 76,095 |
| 種植業 | 312 | 44,600 |
| 畜牧業 | 121 | 32,605 |
| 漁業 | 123 | 14,380 |
| 採掘業 | 130 | 32,221 |
| 製造業 | 12,042 | 2,533,180 |
| 食品加工業 | 744 | 97,638 |
| 糧食及飼料加工業 | 144 | 23,701 |
| 植物油加工業 | 32 | 13,177 |
| 屠宰及肉類蛋類加工業 | 83 | 9,752 |
| 水產品加工業 | 156 | 12,890 |
| 石油加工及煉焦業 | 49 | 13,884 |
| 化學原料及化學製品製造業 | 867 | 175,874 |
| 合成材料製品業 | 136 | 27,449 |
| 非金屬礦物製品業 | 737 | 146,533 |
| 水泥製造業 | 19 | 26,383 |
| 磚瓦、石灰和輕質建築材料製造業 | 312 | 47,587 |
| 輕質建築材料製造業 | 92 | 14,819 |
| 玻璃及玻璃製品業 | 99 | 17,833 |
| 建築用玻璃製品業 | 17 | 2,804 |
| 陶瓷製品業 | 156 | 30,453 |
| 建築、衛生陶瓷製造 | 51 | 23,695 |
| 普通機械製造業 | 485 | 90,447 |
| 專用設備製造業 | 500 | 74,333 |
| 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 | 369 | 127,421 |
| 汽車製造業 | 181 | 64,423 |
| 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 | 922 | 394,271 |
| 通信設備製造業 | 218 | 86,701 |
| 電子元器製造業 | 88 | 36,170 |
| 電子元件製造業 | 372 | 114,174 |
| 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 | 116 | 163,519 |
| 電力、蒸氣、熱水的生產和供應業 | 77 | 130,057 |
| 電力生產業 | 66 | 123,030 |
| 火力發電業 | 29 | 105,416 |
| 水力發電業 | 27 | 13,477 |
| 其他電業 | 9 | 4,102 |
| 煤氣生產和供應業 | 27 | 7,325 |
| 煤氣生產業 | 12 | 4,241 |
| 自來水的生產和供應業 | 10 | 17,992 |
| 自來水生產業 | 10 | 17,992 |
| 建築業 | 247 | 109,619 |
| 土木工程建築業 | 169 | 106,734 |
| 鐵路、公路、隧道、橋樑建築業 | 71 | 65,627 |
| 堤壩、電站、碼頭建築業 | 2 | 4,333 |
| 房地產業 | 669 | 417,785 |
| 房地產開發與經營業 | 464 | 313,371 |
| 社會服務業 | 1,474 | 301,680 |
| 旅館業 | 61 | 37,952 |
| 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信業 | 205 | 111,401 |

資料來源：《國際商報》，2000年7月31日。

四、美、日多國籍企業與臺商在大陸投資行為及區位選擇之比較

在全球競爭的架構下，多國籍企業的競爭能力對於其競爭優勢的塑造具有絕對的影響，一個廠商在各個不同的地區經營，相對於只侷限在某一狹窄範圍內的經營，能夠比較好的運用其專屬資產獲取較高的利潤，是以跨國公司在海外市場的競爭能力和經驗知識則是其重要的專屬資產。因此，外商憑藉其競爭優勢能力，對地主國特定因素在影響多國籍企業投資區位和企業經營獲利方面，變得越來越重要。

時值外商對大陸直接投資熱潮方興未艾之際，這些外商究竟如何面對高度投資風險實現預期之獲利水準？文獻上較少有深入研究。惟今以大陸幅員遼闊其東部沿海延伸內陸各省區之自然資源種類、質量和數量，人力資源素質，現有資本存量及技術水準，產出規模和經濟效率，各省區間之經濟發展等有極大差異之情勢下，各省區之生產要素價格、運輸成本、租稅優惠、土地使用費、市場結構和群聚經濟效果等各異，對外商在大陸直接投資區位之選擇影響為何？此一課題饒富趣味頗值得探討，然考諸文獻國內亦鮮有以中國大陸為研究對象者。未來本研究擬實證分析多國籍企業在大陸投資區位選擇之影響。目前囿於資料之不足，本節擬先擇要介紹多國籍企業投資區位選擇之文獻；然後再就美、日多國籍企業與臺商在大陸投資行為及區位分布及發展加以說明。

Bartik(1985)以1982年在美國設置新廠的廠商資料，利用 Conditional Logit Model (CML)，實證分析州的工會力量對企業區位選擇具重要影響；租稅對企業區位選擇決策效果不大，但其統計數據的解釋能力為顯著；區位土地面積越大其企業座落的機率也幾乎同幅度增加；群聚效果的估計結果具有正相關且顯著，至於工資率以及公路哩程數在各組模型中的實證結果效果並不一致，且統計上也不顯著。

Culem(1988)以線性迴歸方式觀察1969~1982年間美、德、法、英、荷、比等六國彼此之間之市場大小及成長率、貿易障礙、單位勞動成本、前一期出口及其利率等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行為，試圖找出影響區位選擇之因素。該研究發現，除了美國廠商赴歐洲投資外，愈大的市場和成長率與自由貿易程度，皆會引起廠商較大的投資意願。

Coughlin、Terza and Arromdee(1991)以1981~1983之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ITA) 資料探討州特性對外國企業至美國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研究結果認為某一州若具有較大土地面積、較高的每人所得及廠商密集度、便捷之交通建設和措施，及州政府投入的獎勵海外投資之支出越高，就越能吸引較多的海外企業直接投資；至於高工資率與高租稅負擔則會抑制企業投資意願；而勞工加入工會比率越高，對其吸引外資卻為正效果。

Koechlin (1992) 以 1966~1985 年美國多國籍企業對 23 個國家投資的資料，探討投資國之社會政治因素對投資區位選擇之影響。該研究結果顯示，政治風險程度較高國家較不利於投資；英語系及依賴度較高的國家比較吸引美商前往投資。至於高勞動成本、地理距離愈遠、愈高之租稅負擔則顯著降低企業海外投資的誘因，愈大的市場將對多國籍企業的投資具鼓勵效果。

Wheeler and Mody (1992) 利用 1982~1988 美國多國籍企業對 42 個國家投資的官方統計資料，探討美商對外投資區位選擇的決定性因素。由其研究可知，不同的產業類型在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決定對外投資區位變數也有所不同。

Woodward (1992) 亦利用 Conditional Logit Model (CML) 分析日本 1980~1989 年製造業廠商資料赴美投資的區位選擇。日商對州的區位選擇言，主要係考量市場因素、土地面積大小、州內勞工加入工會比率高低及是否有日本官方代表辦事處，皆會影響其投資意願。對郡的區位選擇而言，群聚效果、人口密度、教育水準、土地面積是吸引日本廠商前往投資之重要因素，且高失業率與黑色人種人口數比率過高也會降低日商投資。

陳建勳 (1994) 則是國內首位利用 Conditional Logit Model (CML) 實證分析中國大陸各省區之特性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之影響，主要以大陸之東、中、西部三大區位，分析比較市場、勞動成本、配置效率、交通運輸及研究發展的區位特性。該研究結果發現，以中國大陸廣大的市場，外商較偏好在中部地區設廠投資再向其他大陸市場作幅射狀擴展，因此中部地區市場變數對外商直接投資具顯著影響；工資係數為負但並不顯著，因此工資變數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之影響不大；代表廠商配置效率的產值稅率變數在西部地區之估計係數符號為負且統計上顯著，表示外商投資西部地區往往著眼於其豐富天然資源礦藏優勢，而非區域經濟配置效率；至於代表交通運輸的鐵路建設由於東、

中部地區已相當發達，因此對吸引外商投資具一定程度之影響力；由於研究與發展將有助於提昇大陸當地企業的技術水準與產品競爭力，外商為延續自有競爭優勢產品的生命週期，將不願意至研究發展較發達區位投資，依此研究與發展變數為負值，且東、中部兩區域顯著，顯示研究與發展將不利於吸引外商投資。

Maekawa (1997) 亦利用 Conditional Logit Model (CML) 實證分析 1986~1996 年日本電子業廠商對亞洲區域的海外直接投資之區位選擇，並探討租稅在企業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中所扮演之角色。研究結果顯示，群聚效果和節省勞動成本之影響較小，而租稅及基礎建設的影響力則較為明顯。

Yamori (1998) 利用 1990~1994 年日本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資料以線性迴歸方式，針對其區位選擇作實證研究，結果發現日本金融業的海外投資區位選擇與日本製造業廠商座落的區位有相當關聯，顯示日本金融業的海外投資主要是針對全球化經營的日本多國籍企業提供服務，惟日本金融業的國際化仍然著眼於其自身的利潤，會先評估其在當地開設分行之機會成本，而非盲目地跟隨製造業廠商步調，貿然進行海外直接投資。

戴育祥 (2000) 以 1988~1997 年我國經濟部投審會歷年核准對外投資資料整合橫斷面 (國別) 及時間序列，利用 Conditional Logit Model (CML) 實證分析臺商對外投資分四大區位的特性及其對外投資區位選擇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就係數符號符合預期且顯著的數目來看，以北美洲的表現最好，其次為歐洲區域、東南亞國家，亞洲已開發或新興工業化國家則不理想。至於勞動成本方面，低廉的工資對赴大陸、東南亞及歐洲投資的臺商較有吸引力；在資金成本方面，除租稅競爭的亞洲國家外，低稅率是吸引臺商前往投資的一大因素；在市場要素方面，龐大消費市場潛在的商機也是臺商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基礎建設的良窳僅影響臺商對北美洲投資意願；而群聚效果則是影響臺商對外投資區位選擇的要素之一，但對於至亞洲已開發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投資的臺商而言，群聚負效果是他們望而卻步的。

由以上區位選擇的文獻中可以看出，若國家與區域之市場愈大、廠商集中程度愈密集、交通愈便利、自由貿易程度愈高、有普及的基礎建設、相同語系

及投資國與地主國之貿易活動越頻繁等因素，將會提高多國籍企業跨國投資之意願。以下概括介紹美、日多國籍企業與臺商在大陸投資行爲及區位分布和發展：

(一)美國多國籍企業在大陸的投資：據統計截至 1999 年美商在大陸投資項目已達 28,702 項，協議外資金額 526.1 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金額 256.48 億美元，僅次於香港（參見表三），而具世界各國和地區在大陸投資速度領先地位，顯而易見；從地區分布看，美國多國籍企業投資區位以京、津、滬以及其他沿海城市如青島、大連、廣州等地爲主，主要考量區位選擇因素爲，交通和通訊發達便於以國際接軌、工業基礎雄厚容易與外國企業協作配套、人力資源技術力量強大可爲跨國經營的多國籍企業提供價廉優質服務等，不過隨者沿海投資成本逐漸上升，較大的美國多國籍企業已有向內地轉移趨勢。

(二)日本多國籍企業在大陸的投資：從表三可知，截至 1999 年日商在大陸投資項目已達 18,769 項，合同外資金額 351.34 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金額 248.86 億美元，僅次於香港、美國而居世界第三位；從地區分布看，日本多國籍企業投資主要分布在廣東、上海、江蘇、北京和遼寧等省市，而以渤海地區投資項目最多，其主要區位選擇因素有其歷史上、地理上、和文化背景上之關聯性的考量，則爲日本諸多跨國投資的多國籍企業調整對大陸投資的新戰略。

(三)臺商在大陸的投資：據表三的統計資料可知，截至 1999 年臺商在大陸投資項目已達 43,516 項，協議外資金額 437.74 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金額 238.63 億美元，僅次於香港、美、日，居世界排名第四。截至 2000 年 7 月臺商在大陸投資金額總計 1,299.9 億美元，從地區分布看，2000 年 1~7 月臺商在大陸投資區位以上海爲 66.69 億美元爲最多，其次依序爲廣東（44.29 億美元）、福建廈門（5.79 億美元）、浙江（2.9 億美元）及其他地區（103.2 億美元），與 1999 年比較除上海直接投資持續增加外，其他地區均呈減少趨勢（Chang，2001）。由於語言、文化的優勢臺商選擇大陸投資是其主因，而面對多國籍企業強勢競爭壓力臺商應積極評估未來的變動趨勢、儘快評估本身是否在產品性能與價格及服務上有足夠的優勢以因應國際競爭、積極與外商合作或策略聯盟以爭取大陸服務業市場、臺商未來投資區位選擇可以考量以大陸重點發展的 16 個高新技

術產業開發區為主。

五、臺灣與美、日多國籍企業大陸投資策略聯盟之可行性評估

本研究計畫從多國籍企業在大陸投資的現狀切入，再總結多國籍企業在大陸投資成功的案例經驗，從而瞭解其存在的困難和亟待解決之問題，分析多國籍企業在大陸投資行為之決定、成因、變遷及未來發展的可能面向，供今後兩岸共同促進彼此的繁榮和促成建立完整國際分工體系貢獻之參考。大陸加入WTO之後可能創造更多新的投資機會，固然值得臺商密切注意並善加把握，但臺商們更應注意新形勢下市場競爭激烈所可能帶來的經營風險，必須有周詳的投資可行性評估。基於風險規避的考量，有意攻進大陸市場的廠商，直接投資活動應多採策略聯盟模式，尤其是與外商的跨國策略聯盟。尤其在大陸政經投資環境若一旦生變，臺灣經濟安全如何確保？歐美日外商之承受能力與臺商可能有所不同？如何加強臺灣與美日多國籍企業策略聯盟進攻大陸市場之評估？應有助於未來臺商國際化及與外商之跨國策略聯盟。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擬根據陳建勳（1994）以 Conditional Logit Model 實證分析中國大陸各省區的市場、勞動成本、配置效率、交通運輸及研究與發展等特性，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之影響為基礎，對多國籍企業在大陸投資行為及區位分布和未來發展，採以下列方式進行：

第一、文獻回顧：擬利用多國籍企業的對外投資理論，依時間的先後將以往的文獻作一歷史回顧；及針對國內外已發表的相關研究成果，加以引述比較。使我們能對過去外商投資策略與多國籍企業的經濟活動，有更深一層的瞭解，並進而探討外商多國籍企業在大陸投資行為比較，從而分析其演變過程及成因，而最終目的在提供臺商對大陸市場投資佈局及應採取的國際化策略。

第二、資料分析：有關總體經貿與投資資料之蒐集，包括大陸經貿部、中國大陸對外經貿部網站（<http://www.moftec.gov.cn>）、中國經濟年鑑等所發布之次級資料，雖然該資料在即時性與正確性有待商榷，但多少可以反映現狀及其

間之差異。或進一步運用經濟學理論探討其經濟意涵。另外也可從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及經建會亞協中心查閱已在臺灣的外商多國籍企業，蒐集他們有在大陸投資的子公司之營運與佈局。

第三、案例分析：擬採取到大陸研究地區對多國籍企業的投資進行實地訪談及問卷調查方式進行。雖然此方式在執行上的困難度較高，唯本研究希望從各個不同角度和不同層次佐以生動案例，俾深入分析，我認爲是值得嘗試的。

第四、總結歸納：依研究過程中蒐集之資訊加以整理分析，進而歸納出新的事實、提出個人見解或結論。

總之，要具體瞭解多國籍企業在大陸投資行爲的決定因素及演變過程，應以客觀求是的態度，全面而正確地認識多國籍企業的定義、性質及其政經活動，及在兩岸產生之利害關係和問題，嘗試進行分析並提出自己的看法。目前學界對此類問題研究很少，應當說仍處於起始階段。個人希望在日後研習過程中能研擬問卷及採當地訪談方式，繼續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使我國與大陸經濟及國際經濟順利接軌，從而促進兩岸經濟上的「雙贏」。

肆、研究架構與流程

本研究首章爲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貳、多國籍企業之定義及其在大陸投資之進程；參、整理有關多國籍企業與外人直接投資理論及針對國內外已發表的相關研究成果，加以引述比較；肆、就中國大陸外資政策的演變及吸引外資概況作一般性之論述；伍、進行美、日多國籍企業與臺商在大陸投資行爲及區位選擇之比較；陸、臺灣與美、日多國籍企業大陸投資策略聯盟之可行性評估。

伍、預期成果與研究限制

茲簡述本研究預期成果如下：(一)瞭解大陸外資政策的演變及其影響。(二)瞭解多國籍企業到大陸投資的進程、經驗及存在之問題。(三)大陸吸引外資的產業別及投資來源國。(四)瞭解美、日多國籍企業與臺商在大陸投資行爲及其區位之選擇分析。(五)藉臺灣與美、日多國籍企業大陸投資策略聯盟之可行性評估，

俾穩健發展臺灣企業國際化目標。

本研究限制在於多國籍企業在大陸能有系統且大規模的投資方才開始，對大陸之政治、經濟與社會之發展其影響尚未充分展現，可參考之文獻及資料不足之情況下，本研究計畫書不免有舛誤及缺陷尚待補強，敬請 惠予批評或指正。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份

- 王志樂 (1996),《著名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中國大陸:中國經濟出版社。
- 王思粵 (2000),「大陸對外貿易與吸收外資:跨世紀的回顧與展望」,《2001 年全球經濟展望:前瞻新世紀、新局面下的臺灣》,頁 381~406,臺北:中華經濟研究院。
- 高長等 (1995),《臺商與外商在大陸及東南亞投資行爲之調查研究:以製造業爲例(二)》,中華經濟研究院受託研究計畫,臺北: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 高長等 (1996),《臺商與外商在大陸及東南亞投資行爲之調查研究:以製造業爲例(三)》,中華經濟研究院受託研究計畫,臺北: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 陳建勳 (1994),《中國大陸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之實證分析》,經濟專論 150 號,臺北:中華經濟研究院。
- 陳麗瑛等 (2000),《多國籍企業在兩岸投資與生產分工之調查研究》,中華經濟研究院受託研究計畫,臺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 張佩珍 (1996),《中國大陸經貿發展策略變化之評估及其對兩岸潛在影響之研究》,中華經濟研究院受託研究計畫,臺北:國家統一委員會。
- 蔡宏明 (2000),「兩岸加入 WTO 後對臺商投資經營的影響」,《民國 89 年大陸經濟發展研討會》,頁 163~190,臺北:中華經濟研究院。
- 戴育祥 (2000),「臺商對外直接投資區位之選擇分析—Conditional Logit Model 的應用」,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碩士論文,臺北。
- 顧瑩華 (2000),《臺商在東南亞與大陸投資行爲之比較與我國因應對策》,中華經濟研究院受託研究計畫,臺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二、英文部份

- Bartik, Timothy J. (1985), "Business Locations Deci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Estimates of the Effects of Unionization, Taxes,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of States,"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3(1):14-22.
- Buckley, Peter J. Mark Casson (1976), *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Publishers.
- Chang, Pei-chen (2001), "The Rise of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in China--A Formidable Challenge to Taiwan's Economy," *China Perspectives*, forthcoming.
- Coughlin, Cletus C., Joseph V. Terza, and Vachira Arromdee (1991), "State Character and the

-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3: 675-683.
- Coughlin, Cletus C. and Eran Segev (2000) ,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A Spatial Econometric Study,” *The World Economy*, 23: 1-23.
- Culem, C. C. (1988) , “The Locational Determinants of Direct Investments among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2: 885-904.
- Dunning, John H.(1979),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Hymer, Stephen H. (1976) ,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Investment*, PH.D. Dissertation, MIT (1960) , Published by MIT Press, Cambridge M.A.
- Koehlin, T. (1992) ,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Location of USA Direc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6(2): 203-216.
- Kojima, Kiyoshi (1978) ,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 Japanese Model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 Vernon, Raynond (1966) ,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0: 190-207.
- Wheeler, David and Ashoka Mody (1992) ,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ocation Decision: The Case of U.S.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3: 57-76.
- Woodward, Douglas P. and Robert J. Rolfe(1993) , “The Location of Export-oriente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Caribbean Bas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4(1): 121-144.
- Yamori, Nobuyoshi (1998) , “A Note o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Multinational Banks: The Case of Japan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2: 109-120.